

● 唐力行
主编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第七期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唐力行 主编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第七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第7期/唐力行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1609-1

I. ①江… II. ①唐… III. ①社会发展—华东地区—文集
②华东地区—地方史—文集 IV. ①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996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第七期

唐力行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609-1

2015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6½

定价: 38.00 元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编委会

主 编 唐力行

副主编 钱 杭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学强	王卫平	王国平	王国斌	王家范	王振忠
王璩玲	井上微	卞 利	包伟民	李伯重	李孝悌
朴元熇	朱小田	朱荫贵	白井佐知子	刘 昶	
刘石吉	池子华	许纪霖	严耀中	苏智良	巫仁恕
吴建华	陈 江	陈忠平	邹逸麟	邱澎生	邵 雍
张海英	范金民	周育民	钱 杭	徐茂明	唐力行
陶水木	章 清	曹树基	萧功秦	常建华	滨岛敦俊
熊月之	熊秉真	樊树志	戴鞍钢		

编辑部主任 徐茂明 副主任 洪煜 编辑 王健 申浩

主办 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SJ0703);上海市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S30404)

稿约启事

一、《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办,2009年创刊,自2015年起每年暂定出刊两期。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是区域社会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目前开辟有理论探索、学术评述、江南经济、江南文化、江南社会等栏目。本刊及时反映江南社会历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欢迎广大史学工作者惠赐佳作。

二、本刊以发表高水平的中文研究成果为宗旨。欢迎有关理论的创新,尤其是本土化社会史理论的建立、新资料的挖掘(包括档案、碑刻、口碑、实物资料等)、社会史的新视野、历史评论等方面的优秀稿件。

三、来稿一般应在15000字以内;重大选题的稿件,字数不限。本刊采取匿名审稿制度,对所有投稿一般在收到稿件两个月内作出处理。一经刊发,奉寄稿酬。稿件一般应为A4纸(36×36字)打印稿,并邮发电子版至本刊编辑部。

四、稿件应遵守学术规范。严格禁止剽窃、抄袭行为。

五、文稿请务必参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规范),著录文章题名、姓名、工作单位、关键词、摘要、作者简介、注释、参考文献等项目。

地址:上海市桂林路100号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

邮编:200234

收件人:徐茂明 洪煜

电子信箱:xumaoming@263.net hongyu1028@263.net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编委会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第七期)

江南经济

- 1 戴鞍钢
近代江南农副业的嬗变
——基于地方志等文献的考察
- 18 〔日〕夏井春喜
赋从租出
——近代苏州的田赋与田租之关系

江南文化

- 37 樊树志
“掀翻天地”的王门弟子
- 66 王振忠
一位落魄徽商的自白
——稿本《记忆平生事迹》研究
- 74 潘 讯
胡朴安与包世臣
——兼及南社人物研究的一个视角
- 89 李 明
苏州评弹研究的奠基人
——读周良的《伴评弹而行》

118 申 浩

近代上海都市中的评弹票友与票房

131 张盛满

民国苏沪地区评弹艺人的茶会功能试析

江南社会

146 钱 杭

由卷册规模论及 1960 年代浙江新谱的历史地位

159 吴建华

明代王鏊诫子书浅析

174 胡勇军

国家权力渗透下的乡村危机:1934—1936 年苏州农民抗租风潮

原因解析

188 〔韩〕俞莲实

明清时期生育控制观念与其实践

209 朱新屋

“吴中积善之家”

——善书与苏州彭氏家族传统的形成

学术评述

226 唐力行

书序三则

237 钱 杭

“第八届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前沿论坛”会议综述

243 2014 年江南研究论著索引(上)

江南经济

近代江南农副业的嬗变^{*}

——基于地方志等文献的考察

戴鞍钢

内容提要:近代上海开埠后,很快成为中国内外贸易第一大港和经济中心城市。受此推动,江南传统的蚕桑业有明显发展,上海城郊则有新兴的蔬果花卉种植及畜牧养殖等业的经营。

关键词:上海 江南 蚕桑 蔬果花卉 畜牧养殖

关于近代江南农村经济的变迁,中外学术界以往研究成果颇为丰硕^①。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利用较能具体反映基层经济社会状况的地方志等乡土文献,重点论述蚕桑业的起伏和上海开埠后城郊蔬果花卉种植及畜牧养殖等业兴盛的历史进程,以期从一个侧面加深对近代江南农村经济变迁相关问题的认识。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1AZS006)的阶段性成果,亦获2010年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立项资助。本文所论述的江南,主要是指其核心区域,即太湖平原和杭嘉湖地区。考察的时段,侧重于1843年上海开埠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① 由陈忠平、唐力行主编的《江南区域论著目录(1900—2000)》(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对此已有较为全面的梳理,本文不再罗列。近年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成果有朱云云等《江村变迁:江苏开弦弓村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张丽的《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中华书局2010年版)等;亦有丁贤勇的《近代交通与乡村社会的商品流通:以浙江为中心》(载刘昶等主编:《水乡江南历史与文化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其论述的重点是1930年代的浙江。

太湖沿岸和杭嘉湖平原即江南的核心地带,素来是著名的蚕桑产区。但鸦片战争前,受对外通商限制的阻碍,只能以内销为主,外销比重甚微,嘉道年间每年出口约一万担,“蚕业终不大兴”。原因之一是,受当时广州一口通商禁令的束缚,江浙生丝出口须长途运输至广州,行程约 3500 里,历时近百天。“由产区运粤之路程,较之运沪遥至十倍,而运费之增益及利息之损失等”,据估计约增成本 35% 至 40% 之多。^①

上海开埠后,江浙地区所产生丝纷纷就近转由上海港输出,蚕桑业的发展因此得到有力的推动。明清时,浙江吴兴县双林镇丝业已兴,“旧时有闽广客商来镇采买,自上海洋商集市而远客不来,惟各处丝商来镇抄买,或行家及土商自往上海销售”^②。当地丝商亦相继崛起,“清道咸时上海犹未通商,洋商居香港已有镇人包丝往售,蔡兴源、陈义昌等皆以此起家,积资巨万;及五口通商,则有姚天顺、俞源元、施福隆等,而后震源、陈三益、凌成记相继而起,选头二号白丝运至上海直接售于洋行,有震源、风云、三益、文鹿、成记、雪梅等丝牌,常年出口者三千余担”^③。

在浙江湖州,“湖丝出洋,其始运至广东,其继运至上海销售”^④。当地著名的辑里丝,“在海通以前,销路限于国内,仅供织绸之用,即今日所谓之用户丝,其行销范围既小,营业不盛。迨东印度公司来华通商,始有邑人冒险航海至广州,经公行之手与英商交易,一时无不积资甚巨”。自上海开埠,“辑里丝乃运沪直接销与洋行,实开正式与外商交易之端”。^⑤ 1928 年的实地调查载:

丝有粗细之分,粗丝亦称“用丝”,在吴兴多用以织绉。如经过整理手续即可织绸者,则谓之经丝。细丝亦称“运丝”,多数运销上海以通洋庄。又湖州

① 何良栋:《论丝厂》,《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三十六;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535 页。

②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六《物产》。

③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七《商业》。

④ 民国《南浔志》卷三十三《风俗》。

⑤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编:《吴兴农村经济》,该所 1939 年版,第 121 页。

运销于上海之细丝,通称曰“辑里丝”,其摇匀条纹接好断头者谓之“辑里经”。辑里系距南浔镇7里之村落,又名七里村,所产丝质良佳,色泽粘韧,确较他处为优,洋商多喜采购,因之辑里丝遂驰名于国外市场。嗣后凡吴兴境内所产之运丝,为求畅销起见,咸冒称为辑里丝,而辑里丝亦成为一定品质之运丝统称。^①

声名因此远播,产销趋于鼎盛,蚕事乍毕丝事起,乡农卖丝争赴市,“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② 在湖州的菱湖镇,

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塞。菱湖多出蚕丝,贸易者倍他处,盖由来久矣,其专买乡丝载往上海与夷商交易者,曰丝行;别有小行买之欠饷大行及买丝客人者,曰钞买者;更有招乡丝代为之售,稍抽微利,曰小领头,俗呼白拉主人,镇人大半衣食于此。至吾镇出丝每八十斤为一包,每岁约近万包,为一郡冠。^③

浙江嘉兴桐乡县,“北乡多细丝,南乡多肥丝,细丝可售诸洋商,肥丝则仅供本地机户及金陵贩客;浙西产丝以湖州为盛,而县属青镇亦岁报丝捐一二十万斤,在嘉属为独多,南乡之肥丝不过岁报二万余斤而已”^④。嘉兴濮院镇,“吾乡所产介乎肥、细之间者居多,名曰中管肥丝,以供本地绸机及绍客织纺绸者,中管丝亦有由沪运销外洋者曰丝拖头,今亦设庄收买运销外洋,有数万金之价值”^⑤。这种产销两旺的情景,在太湖沿岸和杭嘉湖平原相当普遍。1909年6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以“1908年的上海:对美贸易出口1055万美元”为题,引述时任美国驻沪领事田夏礼发表的统计数字称:“邻近上海的乡农们大约在6月1日收集蚕茧,生丝会以最

① 曲直生等:《浙西农产贸易的几个实例——米粮、丝茧、山货贸易的概况》,原载《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4期(1932年12月),转引自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26、727页。

② 温丰:《南浔丝市行》,《南浔志》卷三十一,第2页。

③ 光绪《菱湖镇志》卷十一《物产》。

④ 光绪《桐乡县志》卷七《物产》。

⑤ 民国《濮院志》卷十五《物产》。

快的速度运到港口,出口到其他国家。下半年的工作量最大。1908年从上海出口到美国的生丝总价达到5250216美元,其中86%是下半年运出的。”^①

鸦片战争前,生丝平均出口量约9000担,按每担350元计,约值315万元,折合202.17万海关两。五口通商后,生丝出口增长甚快,到1894年,出口达83204担,值2728万海关两。^②生丝出口的持续增长,促使国内桑树种植面积和蚕的饲养也在不断扩大。太平天国失败后,江浙等地在战乱抛荒的许多土地改种了桑树,有些地区原来蚕桑业并不发达,这时有了显著的发展。浙江富阳县,“桑树高而叶大,土人名荷叶桑,东南、正南两乡最盛,每有新涨沙地皆植桑树,故较匪(诬指太平天国——引者注)前已多倍倍,桑多如此,蚕丝可知矣”^③;平湖县,“向时邑人治丝者尚少,今则栽桑遍野,比户育蚕,其利甚大”^④。江苏昆山县,“旧时邑鲜务蚕桑,妇女间有蓄之。自国朝同治中,巴江廖纶摄新阳县事,教民蚕桑,设公桑局,贷民工本,四五年后,邑民植桑饲蚕,不妨农事,成为恒业”。丹阳县原来蚕桑业也不发达,“兵燹后,闲田既多,大吏采湖桑教民栽种,不十年,桑阴遍野,丝亦渐纯,岁获利以十数万计”。^⑤

邻近的无锡、镇江等县,都有类似情形。在无锡县,“丝旧惟开化乡有之,自同治初经乱田荒,人多植桑饲蚕,辄获奇羨,其风始盛,延及于各乡”^⑥。1880年5月4日《申报》载:“自兵燹(指太平天国战争——引者注)以来,该处(指无锡——引者注)荒亩隙地尽栽桑树,由是饲蚕者日多一日,而出丝亦年盛一年。近年来苏地(指吴县、吴江县——引者注)新丝转不如金、锡(指金匮县、无锡县,1912年后金匮县并入无锡县——引者注)之多,而丝之销场亦不为金、锡之旺。”据统计,1878年苏州、常州、镇江三府生丝的总产量为355335斤,其中苏州府为82800斤,而无锡(属常州府)为138000斤,超过苏州全府生丝产量66.67%;1879年,上述三府生丝产量为392840斤,其中苏州府为89200斤,而无锡就有153640斤,超过苏州全府生

①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1854—1911)》,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

② 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页。

③ 光绪《富阳县志》卷十五《物产》。

④ 光绪《平湖县志》卷八《物产》。

⑤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484、1488页。

⑥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三十一《物产》。

丝总产量 71.28%。19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无锡一县的生丝产量就超过了江苏传统产区的苏州府,成为江苏最大的产丝县。当地所产生丝由丝行收购,贩运至上海卖给洋行输往欧美,或供盛泽、南京等地的丝织业作纬丝。1896 年,随同友人从上海赴无锡收买春茧的穆藕初记述:“收茧事,向例由华人向洋商包办,运款至产区各大镇,分设收茧各庄于无锡、江阴、武进等处,多者二三十庄,少亦七八庄。为时仅月余,而在事诸人所得酬劳比较为丰,以故人争觅就。”^①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无锡城乡有三大丝市:北门外北圻、南门外黄泥埭和东乡鸿山西侧的唐家桥。这三处共有丝行 30 余家。《锡金乡土地理》载:“丝市至五六月间盛行于北门外北圻及南门外黄泥埭等处,乡民未售茧而自抽丝者,莫不捆载来城,以售其丝焉。东南乡之丝售于南门者多,西北乡之丝售于北门者多。盖北圻和南圻其地为商务云集之处,又为乡人来城之孔道。故丝市之盛每岁有数十百金之货。”而且“历来以春蚕丝为大熟,夏茧丝叫二蚕丝,秋期更少。当春丝上市时,乡村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售丝农民肩背手提,络绎不绝,道为之塞”。另外,“西仓之东二里有鸿山,鸿山西阳有唐家桥,户口约数十户,无市街,惟每年四月间丝市甚盛。苏州丝商及邑人在此开设丝行七所,乡人售丝者甚多,每年收丝约值三十余万元。吾邑丝市除城南、北两处为丝市之中心点外,惟唐家桥之丝曰鸿山丝,为苏、沪驰名”。^② 有研究表明,从 19 世纪 60 年代一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无锡蚕桑业的单位劳动收益基本上都高于稻麦耕作,而且在部分年份里远远高于稻麦耕作;当地农民之所以转向蚕桑业,是因为在国外市场对中国生丝需求的增加下,蚕桑业收益迅速上升。^③

1928 年,上海生丝出口总额为 108021 海关两,占全国生丝出口总额的 59.9%,其中来自无锡的就达 21210 海关两,占上海生丝出口总额的 19.6%^④。1930 年代出版的《江苏六十一县志》载,无锡“桑田约占全县田亩十分之三,农家皆以养蚕为收

① 穆藕初著,穆家修等编:《穆藕初文集(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 页。

② 严学熙:《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 4 期。

③ 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中华书局 2010 年版,彭慕兰序,第 4 页;万志英序,第 4 页。

④ 郑忠:《无锡经济中心形成机理分析——以民国锡沪经济互动关系为中心》,“上海与沿海沿江城市的经济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2006 年 6 月,上海。

入大宗之一”^①。无锡的缫丝厂亦应运而生,1930年有45家,“设于无锡市区者有三十七处,余八处散于各乡区”;其原料即蚕茧,无锡“所产者占三分之一,余均采自宜兴、溧阳各地,产丝约21000余担,以丝每担值银千两计,当值银2100余万两”。上述各厂所产生丝,“大都运上海各洋行转运欧美”。^②1936年,江苏省全年出产干茧约25万担,其中春茧约占65%,秋茧约占35%,“以地方论,则以无锡为最多,占全产量三分之一弱;其次为溧阳、武进、吴县、江阴、宜兴、金坛等县;扬中、江宁、靖江等又次之”^③。1933年的资料载:“浙江为蚕丝出产地,全省七十五县中,产蚕丝者达五十八县,完全以种桑养蚕为专业者亦不下三十余县。每年计产生茧百余万担,生丝八九万担,占全国丝茧总数三分之一。”^④

江浙地区蚕桑业的发展,在上海郊区也有体现。与棉花相比,上海周围农村蚕桑业受水土条件、耕种习惯等影响,长期以来发展迟缓。自上海开埠,受丝出口贸易及缫丝加工业设立的推动,上海地区的蚕桑业也有长足发展,在近郊农村还颇有规模。南汇县,“土俗向不解蚕桑”,至光绪年间,已是“树桑遍地”^⑤。嘉定县“素不习蚕事,故出茧绝鲜。近年上海丝厂盛开,广收蚕茧,乡人始渐讲求,城西一地市茧者年可得数百担”^⑥。该县广福镇,“与宝山接壤,跨杨泾为市。广安桥东市街东西约一里,商店二三十家,属宝界;桥西市街南北约半里,商店二十余家,属邑境。每日早市一次,贸易以棉花、土布、六陈为大宗;清季外商至镇收买鲜茧,茧市称盛”^⑦。该县钱门塘,“向不产桑”,至光绪中叶,人称“无不桑不蚕之家,时号‘小湖州’”^⑧。

上海县四乡因“近来丝厂盛开,收买蚕茧,而育蚕者更盛”,仅法华乡一地,“鲜

① 民国《江苏六十一县志》上卷《无锡县·物产》。

② 无锡县政府编印:《无锡年鉴(1930年4月)》,转引自陈文源等主编:《民国时期无锡年鉴资料选编》,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223、225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爆发前后江苏省及上海市之制丝工业》,《民国档案》2010年第4期,第7页。

④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23页。

⑤ 光绪《南汇县志》卷二十《风俗》。

⑥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五《物产》。

⑦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一《市镇》。

⑧ 童世高:《钱门塘乡志》卷一《乡域》。

茧出售动以数万计”。即便在稍远的青浦县,1909年也有人创设了蚕桑研究社,并在重固乡间栽种桑树二千余株,以求推广。^①金山枫泾镇,“道光时,始有树桑饲蚕者,今(约1891年——引者注)善界(指嘉善——引者注)日盛,而娄界(指松江——引者注)亦有焉”^②。宣统年间,该镇“亦有设丝行茧厂,收买丝茧者”^③。

民国年间仍有所发展,20世纪20年代始,海外化学纤维俗称“人造丝”涌入,渐趋衰落。民国宝山县《杨行乡志》载:“本乡栽桑育蚕,自清季稍有兴办,如胡荣秋、张静年、陈冕卿、杨谱仁、胡师石等数家试验。嗣以欠于讲求,殊难获利,至蚕桑消灭无闻矣。民国九年春,陈家雁由省立蚕校毕业后,选购良种试育,鲜茧洁白坚厚,直接售与上海丝厂。据厂中执事云,此等高货在上宝区内堪称独优,故价亦提高百分之二十以上。惟预未栽桑,需叶远至嘉定陈行、广福购买,致难获利,翌年遂停办。民国十一年,马君武在裳四十九图宅前后栽桑数千株,并请农校蚕科毕业生周廷桢担任指导,成绩颇佳。只以售价低落,致受亏折,遂即停止进行矣。”^④前述广福镇,“前数年茧市颇旺,近已式微”^⑤。

作为以出口为主要导向的江南蚕桑业,除了在国内遭遇前述“人造丝”的市场挤压,还时常面对一旦国际市场波动,势必直接受到冲击并受损的严峻局面。据统计,1927年至1929年,中国生丝出口增加了18.74%,而美国华丝市价却跌落12.98%,至1930年美国华丝市价跌落几近一半,而华丝出口量乃开始下降5.36%,国内出现蚕丝生产的缩减^⑥。1928年对上海近郊农村的调查指出:“漕泾镇及龙华镇一带农民,栽桑育蚕者居多,桑树之栽培及整枝均颇合理,丝茧由龙华茧行出售于缫丝厂。惟近来丝价低落,有将桑园改种他种农作物而停止育蚕者。”大场、三林等区,“数十年前农家多喜养蚕,今因蝇害或无利息,相率停止。现在只有杨思区尚有养蚕者五十余家,年产鲜茧五千余斤;陆行区年产鲜茧八九百元”。莘庄,“在二十年前,育蚕者约有数家,每年产茧20余担,嗣因无利可获,渐致改图

①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八《物产》;民国《法华乡志》卷三《土产》;民国《青浦县志》卷二《土产》。

② 光绪《重辑枫泾小志》卷一《区域·食货》。

③ 宣统《续修枫泾小志》卷一《区域·食货》。

④ 民国《杨行乡志》卷九《实业志·农业》。

⑤ 民国《宝山县续志》卷一《市镇》。

⑥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别业，今则蚕桑无人过问矣”。^①

1930年出版的《无锡年鉴》亦载：“自无锡辟为商埠，邑民趋重工商，丝茧为主要出产。农民竟将高田改艺桑柞，从事育茧，产谷之田近年减少。近五年内，茧价低落，而桑价亦降，桑田改作稻田，为各村普遍之倾向。”^②1921年前后，蚕桑产销兴盛时的浙江吴兴农户，蚕桑与种稻比较，蚕桑收入占七成，种稻收入占三成；1934年，其比例则变为种稻收入占七成，蚕桑收入占三成。^③1936年，浙江嘉兴硖石的张鹤龄以纪实体裁，描述了生丝滞销、价跌给蚕农生计乃至乡镇经济的伤害：

镇上的几家茧厂，今天开秤了。所以冷清了几星期的街头，便顿形热闹了起来。

旧历四月的乡村是个最忙的时节。每一户合家的男女，都把全副精神集中到育蚕的事务上去了，除了有免不来的事故外，谁也没有余暇再来上市。于至使本来萧条的乡镇商业，更加的冷清，落寞。据乡镇商业的经验来说，这段的时期叫做“蚕关门”。

今天，这扇因蚕忙而关的乡镇之门，算是第一天开啦。

经纶茧厂的门首，贴上了一张用红纸写的“开秤大吉”的字条，四面环环的挤成了一个人圈。从杂乱的声浪中，带透出一阵阵的热浪来，使初夏试伸的热度，又增高了些。

一簇簇椭圆形的雪白得可爱的茧子，经过了秤手先生的一度秤量讲价的交涉后，便向着茧厂的仓间内送。^④

但售出了茧子的蚕农的脸上并无喜色，有人抱怨：“天地良心，我们并不望再有像从前一百多元一担的茧价和一百多元一百两的丝价，现在只要能够到五十元吧，我们辛苦了一时的，也能得到一点好处，那末大家也心服情愿了。”虽然镇上商家的伙计们，“竭力地向他们招徕着，然而没有发生效力，因为他们袋中的钞票，早已派

① 《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转引自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426、483页。

② 王立人主编：《无锡文库（第二辑）·无锡年鉴（第二册）》，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③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第28、29页。

④ 张鹤龄：《茧市》，陈伟桐主编：《嘉禾春秋》第4辑，嘉兴市历史学会等2001年编印。

定了用途,纳税还债只怕嫌少。所以这街头只是一场空热闹,这镇上的商业却并没有多大起色”。^①

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发展,增加了对商品粮的需求,因而促进了粮食商品化的发展。特别是在农产品商品化较发展的江南,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使得粮田面积相对缩减,食粮不足部分需仰赖内地产粮省份供给。据统计,1840年中国国内市场的粮食流通量(包括运到通商口岸供出口的部分)为233亿斤,至1894年则达372.5亿斤,增长约60%。^② 1869年,经上海、天津两地周转的国内米谷运销量分别是37327担和16037担,1890年则为4770226担和1238477担,增长幅度高达百余倍。^③ 江苏吴江县,“自泰西通商而后,多运白粳至上海”^④。江苏六合县,“四乡农产以大小麦、豆、稻为大宗”,以往“多贩运至浙江海宁之长安镇,光绪间改趋无锡、上海”;其“稻、豆、麦岁销无锡、上海,舟车运往,源源不绝”^⑤。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曾奏称:“查上海向产木棉,出米无多,不敷民食,素赖商贩运济。统计城厢内外南北两市,每日约需米五千数百石”,其中有来自近郊松江者,“上海赴松采米,以五月间为最盛,至多之时,一日诚有七八十起”。^⑥

无锡米市也小有名气,1930年的《无锡年鉴》称:“碾米一业,在无锡实业上占重要地位。厂址俱在西门外一隅,而在江尖者更占半数。该业始创于废清宣统元年,迄民国十八年止,计有十四家之多。……所碾原料,系稻与糙米,来源大多属于安徽及本省,将其轧成白米,分售各处以充民食。”^⑦1931年的资料载:“上海从开埠以来,居民骤增,最近估计在三百万以上,食米的供应仰给外县,其来源以常熟、无锡为最多,缘该两县既属产米之区,又系聚米之地。常熟的米源,系常州、江阴等货色。无锡为水陆交通的中心,且有逊清漕粮的历史,宜、溧、金、丹、澄、武等货,大半堆存于此,米市营业不亚于上海。此外,还有商船公会的水贩帮,即船主自行出资

① 张謇龄:《茧市》,陈伟桐主编:《嘉禾春秋》第4辑。

②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3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73页。

④ 光绪《平望续志》卷一《风俗》。

⑤ 民国《六合县续志稿》卷十四《实业志·商类·农产物》。

⑥ (清)刘坤一撰,陈代湘等校点:《刘坤一奏疏》(二),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170页。

⑦ 王立人主编:《无锡文库(第二辑)·无锡年鉴(第二册)》,第34页。

向产稻区域装运,因此苏皖各县的米都在沪行销。”^①当长江三角洲的产粮地遭遇歉收时,亦有从上海米市调剂者,1934 年中南银行的市场调查载:“今年江浙米谷秋收,比之往年缺少甚多。据米业中人之统计(抵照大概而论,并不十分详确),要比往年短少十分之四,如嘉兴、海宁、江北一带,更见遭受旱灾之猛烈,因此在秋收之际,浙路内地与无锡帮均到上海采办洋客米。去年有米运沪之江北,近来反多运去,江北南面以通、崇、海一带为更甚。”^②

二

上海开埠后,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大和相关行业的发展,城市人口增长迅速,1843 年约为 27 万,至 1910 年已达 128 万余人,跃居全国首位^③。适应这种变化,一批蔬菜产地在上海近郊陆续形成。1862 年抵沪游历的日本人名仓信敦记述:“经西门外,过田塍间,村民既异菜根、南瓜、黄瓜、茄子及其他杂菜至上海城下鬻售,货物绵绵不绝。”^④嘉定县真如乡,“自上海辟为租借地后,中外互市,人口日繁,需要巨量之蔬菜。农民以应供求起见,有舍棉、稻而改艺者,功虽倍,应时更替,年约六七熟,获利倍蓰,本乡之东南部大都如是”。宝山县江湾里,“自商埠日辟,向以农业为生者,辄种植蔬菜,杂蒔花卉,至沪销售,获利颇不薄”^⑤。

王韬记述:“北郭外,多西人菜圃。有一种不识其名,形如油菜而叶差巨,青翠可人,脆嫩异常。冬时以沸水漉之,入以醃酱即可食,味颇甘美。海昌李君壬叔酷嗜之,曰:‘此异方清品,非肉食者所能领略也。’薤菜一种,亦来自异域,茎肥叶嫩,以肉缕拌食,别有风味。”^⑥1924 年上海县的农村调查载:“杨思乡新创蔬菜种植场

① 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费指数:民国十五年至二十年》,该局 1932 年编印,第 20 页。

② 夏秀丽等整理:《中南银行档案资料选编》,《近代史资料》总 127 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1 页。

③ 〔美〕墨菲著,章克生等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2 页;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90 页。

④ 〔日〕日比野辉宽、高杉晋作等著,陶振孝、阎瑜等译:《1862 年上海日记》,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358 页。

⑤ 民国《真如志》卷三《农业》;民国《江湾里志》卷五《农业》。

⑥ 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 页。